

新加坡客家發展的文化政治：跨國連結、彈性關係與文化詮釋

柯朝欽*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引用 Aihwa Ong (王愛華) 關於海外華人的「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 分析取向，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近年來的社團活動與其客家論述為分析對象，探討新加坡客家文化發展的模式特質。依此，本文並不著墨於公民權的討論，而是著重於跨國資本流動與客家文化詮釋之間的關係。本文藉由對客家社團的活動分析指出，新加坡客家的獨特性正是在於對客家精神的文化彈性詮釋，不管是上個世紀的 30 年代，還是 21 世紀的近 15 年來，都明顯的鑲嵌於跨國政商網絡的關係建構之中。高度經濟全球化的新加坡，其客家文化的特質就是在跨國商業關係網絡的連結之中伴隨著對客家文化的彈性詮釋創造，兩者其實共構並行，相輔相成。這樣的新加坡客家特色事實上從上世紀的 30 年代延續至今。

關鍵字：新加坡客家、客家精神、海外華人、彈性公民、跨國性

* E-mail: chaoching@faculty.nctu.edu.tw

投稿日期：2017 年 3 月 9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7 年 7 月 11 日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ingaporean Hakka: Transnationality, Flexible Relation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hao-ching K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Aihwa Ong's (王愛華) perspective on the "Flexible Citizenship" of overseas Chinese to analyze The Nanyang Khek Community Guild's activities and discourses on Hakka and identify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Singapore's Hakka. By study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Hakka Association,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he Singapore Hakka's uniqueness lies in the flexibility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n Hakka spirit. From the 1930s to the present day, this spirit has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and business network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s a nation that has integrated itself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Hakka culture is similarly characterized by its transnational commercial networks.

Keywords: Singapore Hakka, Hakka Spirit, Overseas Chinese, Flexible Citizenship, Transnationality

* Date of Submission: March 9, 2017
Accepted Date: July 11, 2017

一、前言

新加坡的客家社團近幾年來對於客家文化的提倡、保存與發揚，展現了極為有活力與旺盛的企圖心，並獲得許多成果。例如，以茶陽（大埔）會館為例，2008 年的 10 月 3 日到 5 日，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舉辦了隆重的慶祝成立 150 週年大會。慶典主題是：「心系家園·志向四方」。可以看到茶陽會館的慶典有意呈現既以新加坡作為「家園」，又試圖凸顯作為海外客家移墾歷史的拓展「四方」精神。而從邀請的來賓可以看到茶陽會館「連結四方客屬」的盛大陣容，與會來賓除了地主貴賓新加坡總理也是茶陽會館榮譽顧問的李顯龍之外，重要貴賓還有「中國駐新加坡大使張小康、梅州市書記與常委李純德、梅州市政府副市長陳衛平、縣書記丘小宏、縣長謝志雲、大埔縣委、大埔縣政府代表團、大埔鄉親……等人」；來自台灣的則有「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劉盛良率領的代表團 13 人……再加上世界各地客屬相關團體。這次慶祝大會邀請的來賓總共高達 1,600 多人（《世界客報》（*The World Hakka Report*），2014）。¹

根據《客報》該文的報導與描述：在慶祝 150 週年的活動之前，為了迎接這次的 150 年慶，更早之前的幾個月，「在 2008 年 6 月到 9 月，茶陽會館聯合 19 個客屬會館團體舉辦了『客家文化節』，以開拓國人眼界，讓新加坡其他族群更加瞭解客家文化。此活動引起熱烈迴響，

1 上述報導引用一篇來自受邀參與者江彥震（世界客屬總會會長辦公室主任）發表於「《世界客報》部落格」網站的現場報導文章。《世界客報》（*The World Hakka Report*），〈茶陽會館 150 周年慶〉江彥震。http://john380920.blogspot.tw/search?updated-min=2014-01-01T00:00:00-08:00&updated-max=2015-01-01T00:00:00-08:00&max-results=50 擷取於 2017 年 2 月 20 日。

並因此成功籌款一筆金錢來贊助三家中醫院的設立」。而就會館近幾年的活動力情形來看，該文寫道：「近年來茶陽會館活動頻繁，不斷吸納新會員，啟動多元文化節目。開創客家歌曲傳唱，掀起熱潮，在短短三年內，使得幾近絕跡的客家歌曲傳遍四方，大眾津津樂道。客家文化研究室成立，出版論文集，舉辦文化座談會，積極推動客家文化，成績顯著」，「茶陽會館稟承中華文化優良傳統，走在時代前端，形象鮮明開放，會務蓬勃發展，成為新加坡最活躍的華社團體之一」。

茶陽會館的慶祝活動確實是成功的，並且其推廣客家文化的諾言也不只是一個船過水無痕的慶典節目語言而已。從事後成果來看，截至2016年為止，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茶陽會館不只斥資成立客家文物室、成立客家文化研究室，無論在贊助研討會、結合學術機構、出版客家書籍或者引發年輕一代投入客家文化探詢上，可以說都取得豐富的成果，不僅使新加坡迅速成為南洋客家研究的一個中心，而且也可以說使新加坡成為南洋客家人的一個網絡連結輻軸中心（何炳彪 2014；黃賢強 2013）。

除了各式活動慶典，在作為集體記憶的歷史編撰上，新加坡的華人歷史書寫也高度重視客家人在新加坡歷史發展上的特殊地位。「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²為了紀念建國50週年暨總會成會30週年，集結了新加坡的華人學者合力撰寫了一部厚達823頁的《新加坡華人通史》（林孝勝 2015），以資作為「新加坡國史的經、史典範」（序言）。其中，在敘述華人的各幫群歷史時，它如此描述客家人：

2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是新加坡獨立後於1985年成立的一個統屬所有新加坡華人會館的總機構。

客家人是一個勇於闖蕩、富有冒險精神的族群。早在 18 世紀，客家人已經在西加里曼丹的三發 (Sambas) 及坤甸 (Pontianak) 一代開採金礦，人數達兩萬餘人，大多是梅縣、大埔及海豐陸的客籍人。他們組織了許多公司，如「大港」、「三條溝」及「蘭芳」公司等。18 世紀末，客家礦工遭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鎮壓，潰散到砂勞越的石門 (Bau)。早期新加坡的客籍移民，可能一部分來自西加里曼丹，砂勞越及檳甲 (按，指檳城與麻六甲) 等地。(崔貴強 2015: 59-60)

這樣看來，當新加坡於 1819 年開埠時，幾乎建城一開始就有客家人來居住了。南洋客家人的拓荒歷史也成為新加坡華人歷史敘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根據 1881 年公布的人口調查，新加坡華人中最多的是福建人 (24,981 人)，依序則是潮州人 (22,644 人)、廣府人 (14,853 人)、海峽華人 (9,527 人)、海南人 (8,319 人)、客家人 (6,170 人)、其他 (272 人)。可見在 19 世紀末，新加坡的客家人口甚至比海峽華人 (峇峇人) 與海南人還少，僅佔人口數的 7% (林孝勝 2015; 李小燕 2007)。在 19 世紀中葉後，新加坡雖然成為華人勞工貿易的輸入中心，每年有大量的客家男性移工登岸，但可以想見大部分只是把新加坡當作轉進馬來半島錫礦場的出入口而已。此後，新加坡客家人的人數雖有持續成長，但在華人人口的比例中卻持續往下降。1891 年的客家人有 7,402 人 (佔華人 6.1% 比例)，1901 年為 8,514 人 (佔 5.2%)，1911 年為 11,947 人 (佔 6.6%)，1921 年為 14,572 人 (佔 4.6%)，1931 年為 19,222 人 (佔 4.6%)，

1947年為39,988人（佔5.5%）（李小燕2007）。1947年之後為阻止共產黨員擴大，禁止了華人勞工的移民，而獨立後的新加坡，人口統計不再按福建人、廣東人等分類，新加坡政府承認的「族群」劃分是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歐亞裔等等，所以沒有正式的客家人統計人口。但是一項對於語言使用情形的調查，卻指出客家語的使用比例在新加坡非常的低。獨立後，在雙語政策以及講華語運動的影響下，2010年的語言使用情形調查統計資料顯示，在華人人口中說福建話者僅剩9%，說廣東話者剩4%，潮州話者是5%，其他華人方言者只剩1%。這1%包含了客家話、海南話、福州話……等等（謝國斌2013）。

綜合以上的描繪，幾個現象很快的凸顯新加坡客家文化發展的特異之處。首先，即使客家人在新加坡的人數最少，即使客家文化顯然較少城市文化元素，但是從上個世紀的30年代開始，新加坡還是出現了像「南洋客屬總會」這樣的組織，並且成為整個南洋海外華人「客家共同體想像」的輸出地，以及組織南洋客家人的中樞（沈儀婷2007；張容嘉2014）。因此，令人好奇的是，在新加坡華人中只佔5%左右，而使用客家話的華人甚至不到1%的情況下，當前蓬勃發展的新加坡客家意識是建立在什麼樣的文化與社會基礎之上呢？其次，當一個「勇於闖蕩、富有冒險精神的族群」，生活在一個像新加坡這樣建立在國際資本匯集的商業城市國家中，到底還能保留多少客家元素並來支撐其客家意識呢？在華人社會中客家人是少數，而這裡既沒有廣大的土地空間可以形成客家聚落，甚至城市中也沒有客家人社區（新加坡有馬來人區、小印度區、牛車水唐人區等等），殖民時期的華人主流語言是福建話，而獨立後說的是英文與打壓方言與傳統幫群意識的華語運動，新加坡這個

極度追求國際化、現代化的商業城市顯然不能容許太多傳統文化元素的殘留，那麼近幾年來似乎蓬勃展現活力的新加坡客家文化發展是建立在什麼樣的動能上？有什麼樣的社會基礎呢？

本文試圖以社會學家王愛華（Ong 1997）對「海外華人」（oversea Chinese）的「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的分析觀點來嘗試對新加坡客家文化的再生產提出一個文化政治的詮釋模式。因為本文分析的對象是客家社團活動，因此本文特別著重在海外華人的跨國資本流動與華人文化的彈性詮釋的相互作用上，而不著重在法律框架下的新加坡公民權的討論；而另一方面，儘管有關聯到，但本文也不以新加坡國家政府在客家文化生產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僅在於藉由分析客家社團近幾年的活動與跨國連結現象，來呈現新加坡客家社團對於什麼是客家文化的詮釋如何與跨國資本的連結息息相關，從而指出新加坡的客家文化其動力與生產基礎具有跨國資本連結的深層影響。³

在方法上，除了使用現有的新加坡客家研究成果外，本文主要以兩大新加坡客屬社團為研究對象，從會館發行的刊物以及實際的拜訪觀察中，分析近幾年新加坡會館的跨國經濟流通與客家文化的相互建構關係。在最後結論之處，本文試圖論述，高度經濟全球化的新加坡，其客家文化的肇始與特質就是在商業關係網絡的連結是伴隨著客家文化的彈性詮釋上，兩者其實共構並行，相輔相成。這樣的新加坡客家特色事實上從上世紀的 30 年代延續至今。

3 因本文採用王愛華的「彈性公民權」論述，因此本文的兩位評審分別建議筆者就新加坡的「公民權」狀態，以及新加坡政府的「國家」角色，兩者加以分析討論。但就寫作篇幅與本人所可取得的資料下，本文僅能著重在「文化詮釋」與「跨國資本」的相互關係這面向上進行論述，另兩個面向或許留待下階段的研究來進行。

二、作為跨國連結的新加坡客家文化

從上一小節的引文中可以推測，最早一批定居新加坡的客家人應該不是新進才從華南下洋過番的移民，而是早就在南洋地區四處流動移墾的客家人。因為當新加坡於 1819 年建城開埠後，很快的在 1822 年就有嘉應州的五屬人士組成了「應和會館」，而且就在同一年，「惠州公司」也成立了（後改成為「惠州會館」）。我們可以從「惠州公司」中的「公司」這個名稱推測，這些最早一批來新加坡定居的客家人應該是在 18 世紀中後葉就已經在南洋四處從事開礦相關活動的客家人了，因為顯然新來到港的單槍匹馬移民不可能快速地以「公司」的名義相互組織起來。從早期新加坡客家人的主要行業也可以推測，他們之所以來新加坡居住，可能是主要從事於建築、木工、鐵匠等工作與擁有這幾項相關技能的人，一般來說，一個新興擴建中的商業城市非常需要這類技匠工作。

新加坡開港建城後，展現了持續的發展繁榮景象，並且隨著鴉片戰爭後通商口岸的開放以及移民勞工的自由開放，因此吸引一批又一批的華人移民，但是客家人卻一直在新加坡的華人口比例中是最少的。「大概是由於新加坡是一個國際貿易港，而客家人擅長的是開礦與墾殖，所以新加坡對客家人吸引力不大。反觀馬來半島、砂勞越、沙巴、加里曼丹等地，礦產豐富，地大豐富，足供客家人大展拳腳，所以這些地區都曾是客家人的聚集地區」（崔貴強 2015：60）。

作為一個貿易商業城市，該如何將這群「四處闖蕩」，到處拓荒墾

礦的客家文化吸納為新加坡城市歷史的一環呢？為什麼在南洋地區最早倡議客家意識與客家文化的不是在擁有眾多客家人的礦場地區，而是誕生在新加坡這個城市中呢？當然，直接的答案是因為新加坡是南洋地區的中樞神經城市，因此像上世紀 30 年代胡文虎這樣的企業家自然會選擇在這裡組織「南洋客屬總會」，並且一邊辦報紙一邊宣傳民族意識，一邊宣傳客家精神；一邊促進華人／國民的文化現代化，一邊宣傳自己的商品；一邊鼓勵華僑愛國大團結（積累政商人脈），一邊凝結客家人成為客家領袖（擴大社會支持）（沈儀婷 2007，2013；張容嘉 2014）。因為不只胡文虎如此，更早之前的清廷南下設領事館以統攝華人、康有為南下鼓吹維新運動、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等等，顯然，想要影響南洋華人都必須以新加坡作為基地而展開（黃賢強 2011）。

然而，如果那個時代有這樣的海外華僑時代精神背景作為基礎，那又要怎樣理解近十多年來新加坡客家意識的蓬勃發展呢？當新加坡已經獨立成為一個新國家並歷經半個世紀的新加坡國民意識打造後，當英語已成為主要通行語言，當經歷多元族群融合政策以及去方言與消解傳統幫群意識的種種政策之後，在只有幾乎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口才會使用客家話的現在，新加坡近幾年的客家社團活動卻顯得比以往更加具活力與發展！要如何回答這個城市國家中特有的客家文化持續發展的動力呢？在一個高度國際化、商業化、資本化的城市國家中，作為傳統幫群文化之一的「客家」（社團／文化）卻比以往更加推廣客家文化，這個現象有什麼社會文化的基礎可以解釋呢？⁴

4 關於新加坡客家社團的活動請參考本文最後附錄所載「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2000-2015 年各式活動一覽表。而相關新加坡客家研究與客家文化蓬勃發展的相關成果可參考黃賢強（2013）、王力堅（2012）、何炳彪（2014），以及茶陽（大埔）會館與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所合作的一系列出版書籍。

現有的相關研究似乎是將這現象歸因於新加坡國家政策的轉向，認為在國家的帶領與鼓勵下，是 80 年代以來傳統會館文化復興的原因（王力堅 2012）。然而，國家或許帶領提倡華人文化，但是沒有跡象顯示國家提倡客家文化。顯然除了「國家」這個角色之外，似乎有必要再尋找另外的社會基礎與動力來源。

本文認為，其實近年來新加坡客家文化的發展現象顯然凸顯了承載客家意識的兩大社會學因素：資本與國家。過往在探討客家族群問題時，往往比較忽略這些人群分類意識背後的社會力量，往往理所當然地以籍貫劃分和語言使用來定義客家人，然後再將這樣定義下的「客家人」現象視為理所當然的客家現象。可是，新加坡客家話的使用顯然跟客家文化沒有必然的關係（至少沒有正相關）：一個逐漸消失、越來越少人使用的語言並不必然導致表示這個建立在這語言之上的文化會消失或不被重視。而且，新加坡不像台灣一樣歷經客家族群運動——經由族群的政治社會運動而將「客家」從一個方言群體建構成一個「族群」（王甫昌 2003）——新加坡的官方族群劃分裡面沒有客家人這個制度性的族群分法。因此，本文認為，正如前面所述，關於新加坡客家發展的歷史特性，顯然不能忽略資本與國家的社會建構性因素。

從新加坡的國家發展特性來看，資本與國家的影響最明顯而直接的表現就是跨國連結的特性上。這個特性從上個世紀 30 年代胡文虎籌組客屬南洋總會中就可以得到表現。王力堅（2012）的研究指出了新加坡國家在 80 年代華人社團的文化轉型中扮演了作用，可是他沒有明確指出新加坡的華人文化復興運動與 80 年代中國開放與後來的經濟崛起有關（即使他這個研究的訪談稿部分強烈的暗示這點）。換句話說，正如

胡文虎看到與南洋各地（客家）華僑和整個中國跨域連結網絡有助於其企業的擴展，同樣的，李光耀也預見中國的開放是一個擴展新加坡經濟連結的一個重要市場（李光耀 2011）。因此，不能忽略新加坡 80 年代的文化轉向背後所隱涵的跨國連結的經濟理性策略，這種跨國連結幾乎可以說就是作為商業城市國家的新加坡的「國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另一方面，相對於福建人、廣東人或潮州人來說，「客家人」的認同本身就更帶有一種跨國、跨地域的屬性。劉宏、張慧梅（2007）的研究指出了新馬地區客家意識中與其他華人不同之處：「相對於潮（州）人社群和其他次社群（如福建人），新馬的客家社群具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特徵，即方言認同強於地緣認同以及身份認同的超地緣性和泛華化。正是這種對普遍性的強調和論說，構成了客家人的特徵之一」（劉宏、張慧梅 2007：325）。他們指出，與潮州人以一個固定且明確的原祖籍認同不同，「客家人原祖籍地具有多重性與相對模糊性」，這使得客家人有更多的方言認同傾向，而正是這種方言認同使客家人更易於建立起一種全國性，甚或全球性的客家認同與聯繫網絡。因此，劉宏與張慧梅認為，（新馬地區）客家認同的一個特殊性就是「地方—全國—全球—祖籍地之間的多重網絡聯繫以及超地域的方言認同」（劉宏、張慧梅 2007：310）。並且，因為缺少一個具體固定的祖籍地認同，客家會館「無法同潮州社群一樣，透過一個具體的家鄉概念及其文化傳統來號召及團結本社人民」，而只能從精神層面上提出一種具有客家特質的「客家精神」做為凝聚本社群的重要力量，「這種差別使得客家社群不像潮人社群那樣執著於一個具體的地域，其觀念和活動都具有跨地域化和泛華化（*trans-local and trans-Chineseness*）的特徵」（劉宏、張慧梅

2007：318）。

本文同意新馬地區的客家認同相對於其他方言群的特點就是這種「地方—全國—全球—祖籍地之間的多重網絡聯繫以及超地域的方言認同」特性，這完全表現在「南洋客屬公會」、「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或「台灣世界客屬總會」等等的名稱上。但是，造成這種客家認同的屬性（泛華化）的原因為何？⁵是否單單只憑藉抽象的「客家精神」便足以支撐起客家的跨國連結與跨國認同基礎？顯然，我們很難相信單單宣揚關於「客家精神」的內涵，就能導致客家認同的普及，以及進行廣泛的跨國連結活動。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以客家精神為名的跨國連結與網絡建立，可能需要更進一步去尋找支撐這種跨國網絡的社會建構基礎。如何解釋客家人為什麼相對於潮州人或福建人更具有有一種「地方—全國—全球—祖籍地之間的多重（跨國）網絡聯繫」特性，筆者在多次實地走訪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各客家社團後發現，可能需要從資本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學角度來加以分析補充（這在新加坡尤其明顯）。而在這方面，顯然王愛華（1997）關於「海外華人」的跨國經濟理性與跨國華人文化分析，顯然也適用於分析新加坡這裡的華人社會中關於「什麼是客家人與客家文化」的論述生產與再生產。

5 劉興張認為，形成客家人認同的這個特性是因為一方面客家人是少數使然，「這一非主流地位所帶來的不利處境」使得客家人更需要跨地域祖籍的團結壯大，另一方面則是客家人的祖籍分散性特點及其對華人性的強調，使得客家社群更傾向於透過方言的紐帶來建立聯合性，乃至於全球性組織，並成為海外華人中最早走上全球化之路的次族群」（劉宏、張慧梅 2007：319-320）。這裡，筆者不同意客家人之所以走上跨國化連結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一個明確的原籍地地域性認同使然，本文後面將會論述，其實在南洋客屬總會誕生之前，新馬地區的客家會館的名稱都是以明確的原祖籍地的州、府、縣名稱來命名的，並不能說原祖籍地太廣泛與模糊。相反，祖籍地的模糊化倒是因為有了客家認同才導致的結果。而且，祖籍地域性認同的模糊化，也是因為客家認同一開始便鑲嵌於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之中（柯朝欽 2015），而使得客家人意識與一個地域性的認同意識有了性質上與階序上的差別，從而弱化或模糊化了客家人的原鄉認同。

王愛華認為，海外華人關於什麼是「華人文化」的跨國文化論述，其實是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有關。她以「彈性公民」一詞來指稱：東亞或東南亞的華人為了應付對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變動所帶來的危機與機會，因此在資本積累、旅行、定居等等方面，面對多重的後殖民的民族國家政治環境，往往採取策略性「彈性／靈活」的居住行動與文化邏輯。如果放到本文脈絡上，簡單說，這裡的「彈性」一方面指的是民族文化與國民身份的雙重性與非同一性（例如是新加坡公民，但是是具有中華文化認同的新加坡「華人」）；而另一個「彈性」意義指的是，什麼是「傳統華人文化」，則是一個可以隨著公民權、選擇移居、旅行或生命情感認同而來的彈性詮釋空間。例如什麼算是「客家食物」、福建話算不算是華語…等等。王愛華以新加坡在 80 年代的「儒學運動」的經驗為例指出，在一個高度資本跨國流動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中，民族國家框架下的文化與公民身份認同已經受到改變，這特別表現在海外華人中關於什麼是「華人（性）」（Chineseness）引發了困難的認同與詮釋分歧⁶：作為一個「種族」（race）的華人與作為一種「文化」（culture）的華人，顯然難以區分。「華人」既可以指稱一個根據民族國家地域界限的道德（情感）連帶實體，也可以指稱一個超越國界範圍的無疆域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力量。因此，她提醒說，當我們提到「華人」一詞時，其意涵顯然包含著一方面存在著民族國家的管制與界線劃分，但是另一方面又有跨區域合作以及流動的、非固定的全球自由化資本流動的曖昧現象。這種彈性的文化詮釋行動，隨著經

濟資本與人力資本的跨國流動，更加使得「華人」這個模糊曖昧的詞，

6 本文對 Chineseness 這個英文字，後續的行文會依文句的順暢與需要分別會譯為「華人（性）」、「華人（文化）」或「華人」。

在這幾十年來在相互限制又相互競爭的（全球化）經濟環境中造成了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尤其是新加坡）兩方分別採取了重塑什麼是「華人（性）」的文化詮釋工作（Ong 1997：55-57）。

本文並不準備討論關於彈性公民的公民權選擇的面向，本文主要論題關注的作為傳統中華文化之一的新加坡客家文化，如何在海外華人的社會中加以詮釋與創造發展。因此，本文更注重的是王愛華對海外華人如何對傳統文化的「彈性」詮釋的背後動力所提出的詮釋框架。她認為海外華人之所以對傳統華人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詮釋，背後一個重要的動力其實是與「經濟理性」的計算有關。例如，她認為海外華人對「關係」的運用很值得注意：「（海外）華人謹慎地利用著關係人脈和實用主義的家風，在帝國邊緣建立家族生意，但事實上這些習慣、態度和規則並不必然是一些本質化的『傳統華人特質』的延續傳承」（Ong 1997：55）。在一個資本全球化流動的時代，海外華人的「經濟理性」直接表現在跨國關係連結的選擇策略上，在這脈絡下「注重關係」在華人謹慎的經濟理性策略下，被順勢詮釋成為「傳統華人文化」的一個重要內涵。因此對王愛華來說，東南亞華人所注重與強調的「關係網絡」其實只是一種歷史上的偶然現象，並不必然是一種傳統華人文化的「本質」，「而其它諸如強調實用主義、關係人脈、事必親恭不愛授權、講求性別差異，或講求年資長老等級等等所謂的『華人（文化）』，其實只是一種（後）殖民形成的習性，並不必然有其華人文化本質傳統」（Ong 1997：57）。

總之，在關於華人的跨國網絡的經濟理性策略中，她認為對什麼是「華人的文化特質」進行彈性詮釋很重要，

因為這牽涉到如何建立跨國／跨域人脈關係，進而產生經濟連結的實踐策略息息相關。在《無根的帝國：當代華人跨國主義的文化政治》（*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1997）（書名暫譯）的編輯序中，她指出：海外華人的中華文化認同並不是建立在一個確切的文化實體上，而是建立在一個多重的跨國關係網絡之中。商人、政治人物、留學生、觀光客、勞工…等等，不同的華人隨著身處全球資本運轉的不同位置與關係，形成了多樣的「華人性」與不一樣程度的文化認同。因此，唯有從文化政治與政治經濟學的交叉匯合，才能進一步深層的去分析海外華人的跨國流動、民族國家與文化實踐之間的關係。

本文將指出，王愛華的分析雖然主要以海外華人的家族企業為對象，但是這樣的分析觀點，筆者認為也適用於東南亞的華人會館，特別也適用於新加坡相關客家會館組織的活動上。而雖然王愛華的「彈性公民」主要是指海外跨國活動的「華人」而不專指「客家人」，但是她所提出的海外華人如何運用「華人（性）」的文化政治邏輯，筆者也認為可以適用於海外華人中如何進行「客家文化的詮釋」上。這當然也特別適用於分析像新加坡這樣一個跨國資本流動中心，以及不斷需要打造公民權認同的海外華人城市國家。因此，本文將採取王愛華的觀點，以「海外華人跨國離散群體」之一的「新加坡客家社群」作為對象，來探討其如何對「華人（文化）」之一的「客家文化」進行「彈性」詮釋與創造，進而重構其公民身份、文化認同與經濟理性的跨國連結。

三、新加坡客家的形成：南洋客家

即使從最生活性與直接性的語言使用來說，早期東南亞華人中是否存在著一種客家方言的認同感，恐怕也很難獲得嚴謹的研究支持。例如，麥留芳（1985）在對檳城、麻六甲與新加坡三個城市中的早期華人的族群分類認同研究中，他從早期的人口普查資料中的居住區位與華人碑文的相互交流中加以分析。發現「福幫人士的方言群認同的程度，實較廣、客幫來得強」，福幫不僅表現在「公塚」較封閉，同樣的「福建人的地域性會館如永春會館，要比廣、客人的寧陽、應和及茶陽會館來得封閉」。因此，麥留芳提醒那些經常會有的預設，即認為東南亞的華人會以方言群作為分類與區隔認同的假設事實上是站不住腳的。他認為（早期）客家人並沒有明顯的語言（方言）認同，反而是經濟地位較富裕、人口比例較多（使用較主流的福建話）的福建人會館，才顯得比較封閉與具排外意識（麥留芳 1985：189）。他認為，至少在整個 19 世紀，東南亞並不存在著一種以方言作為認同的意識。或者這樣說，有方言群的意識，但並沒有方言認同的意識。事實上，從社會生活的角度來看，要在東南亞這樣的高度移民混居的地區，產生一種建立在華語方言的族群認同是很難的。麥留芳認為 19 世紀出現的私會黨、宗教祭祀活動，以及會館組織等的興起，無疑是取代與沖淡了華人的方言群體所造成的隔閡分類。祖籍、宗族、姓氏、地域性原鄉，甚至階級地位等等，才比較可能在華人內部產生人群分類的劃分。

或許，我們可以撇開既有的族群形成的認知框架一下，在既定的籍

貫、地域性或方言認同等因素之外，試著以另一種可能性來想像早期南洋地區作為一個高度人群流動與工商業社會的華人移民社會，其人群分類框架或許更與資本機會的關係凝聚息息相關。因此，新馬地區客家人最早形成的排他性集結，或許並不是建立在語言認同上，而是建立在一種跨國政商關係的連結上。儘管在南洋的城市中，客家人一直位居華人社會中的少數或非主流勢力，但至少在十九世紀末，新加坡歷史學者黃賢強指出，大約 1890 年代一直到 1930 年代之間的南洋地區的華人社會中，就出現了一個跨地域、橫跨政商上層的「客家集團」（黃賢強 2011）。這個集團是由張弼士、張煜男、謝春生、梁碧如、戴欣然、戴淑原等人所組成，他們共同的特色都是從大埔與梅縣來的第一代貧窮移民。然後在南洋事業成功、成為富商與僑領之後，他們都回中國原鄉進行經濟投資、慈善救濟以及興辦學校，並成功建立與中國的工商政界的密切網絡連結。這些人之所以可以稱之為一個（客家）「集團」，是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志業」，並且有著「密切的親屬或事業上的關係」，從而凝結成一個相互呼應的「幫群團體」。作為客家人，他們在檳城的閩幫與廣幫之外形成了「第三勢力」。黃賢強從檳城華人領事、極樂寺的興建，以及檳城的華人學堂辦學這三個面向來分析這個（客家）集團如何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進行交互的網絡連結，進而達到政治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相互積累。而且重要的是，一旦這個跨域網絡的模式成功建立後，在馬來亞半島上挖錫礦致富的客家人也紛紛加入這個模式與網絡，「與北蘇門答臘的客家富商類似，霹靂的客家富商也前往檳城置產及開拓新商機，並投入慈善與文教事業，順利進入檳城華人社會的領導階層」（黃賢強 2011：62）。

不過，這群最早在南洋形成跨域網絡連結的客家富商階層，並沒有任何高舉客家意識的論述與組織。也許他們的連結不過是對於閩幫或廣幫勢力的一種「第三勢力」的反應。儘管這裡可以看到在 19 世紀末「南洋客家」就逐漸形成了一種跨行業、跨地域、跨國家的關係集結，但他們並沒有進行一種跨地域、跨國家的客家文化論述生產，畢竟這時候的「客家人」作為一個特別的族群論述才剛開始在廣東華南一代初步的形成中。儘管他們也進行著關於「華人（性）」的文化政治詮釋工作，並以此來擴大與連結他們的跨國經濟—政治關係網絡，但這主要表現「辦學」與檳城「極樂寺」的興建上，「客家」並不在他們的主要意識中。⁷

從新加坡各相關客家會館成立的歷史順序來看，「南洋客屬總會」應該是第一個以「客家」名稱命名，並以客家進行號召的社團組織。在這之前，新加坡與南洋各客家人會館都以祖籍地區來命名。例如，從歷史發展來看，新加坡客家人的會館依照成立時間先後分別是：應和會館（1822 年），惠州會館（1822），茶陽（大埔）會館（1857），豐順會館（1873），豐永大公會（1882），廣西暨高州會館（原稱三和會館）（1883），永定會館（1918）等等。從上述可以看到，一直到「南洋客屬總會」於 1929 年成立之前，並沒有出現任何以「客家」作為號召凝聚的會館。所以，「客家」意識在新加坡的出現，關鍵年代應該是 1920 年代。而從 19 世紀新加坡客家會館的分立多樣，也可以看到其實就那時的廣東、福建移民群體來說，「客家（人）」並不是一個有效與熟悉的人群分類方式。例如，剛開始客家人的公塚義山就與廣東人共用，而從會館的名稱與跨

7 關於檳城極樂寺興建過程中的文化政治分析，參見薛莉清（2015）、黃賢強（2011）的分析。

幫協力網絡來看，廣東與福建的原鄉籍貫仍是一個主要的人群分類方式。另一個例子是，當「永定人」因為語言不通而不被閩幫納入、受到閩幫排擠時，他們也沒有因此而形成「客家人」的自我意識，而是另外成立永定會館。所以我們可以從上述會館的名稱與成立沿革上看到，客家人一開始是以祖籍地域意識來進行分類聚合的，而不是一開始就以「客家」進行分類。

儘管「客屬總會」的出現可以更早追溯到「1923年，湯湘霖等人鑒於客籍人士南來日眾、散佈區域日大、人事交接日繁，因此興起組織客屬公眾機構的提議」（汪芳紅等 2007：63），但這提議經過多年的籌備始終一事無成。在胡文虎兄弟來到新加坡之後，南洋客屬總會在獲得胡氏有力人士的出錢出力的倡議下，才終於於 1929 年成立。而我們也可以看到，一直到這時「之後」，新加坡才開始分別出現以「客家」為名的會館與組織，例如，武吉班讓客屬公會（1937年）、南洋客屬陳氏公會（1947）、客屬林氏公會（1950）、客屬劉氏公會（1951）、新加坡客屬寶樹同宗會（1957）、星馬客屬廖氏公會（1964）等等。從這些會館組織的名稱與歷史沿革，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南洋客屬總會」的成立對於新加坡的客家意識發展扮演了關鍵的開基角色。換句話說，儘管新加坡一開埠就有客家人定居，但是新加坡的「客家人群意識」，更嚴格來說，其實是在胡氏兄弟捐助「客屬總會」成立運作之後才開始出現並蔓延的。胡文虎個人對於南洋客屬總會的建立可以說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沈儀婷 2007；王力堅 2012；張容嘉 2014）。

依據湯湘霖在《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1938，下簡稱《特刊》）上寫的〈本會十年史略〉即說到：「惟客人之南渡，……雖亦百數十萬，

然有組織之**大團結**，則尚始於十年前，即客屬總會成立時也」（重點字為筆者所強調）。在《特刊》的另一篇文章〈本會創辦經過〉中，他敘述了總會成立的緣由，大致是因廣、客共用的青山亭公塚義山被政府徵收遷移之後，經過交涉獲政府歸還一處土地補償，但是這塊土地要怎麼使用則未定，因此湯湘霖提議在這塊土地上成立一個像漳州人的八邑會館或潮州人的十屬會館那樣的更大型組織，來統屬人數日漸龐大的客家人。這個構想中，原本文章中所謂的「客屬」，其實還原到十年前只是一種地域性概念的進一步擴大而已（因此他特別比喻成像潮州人與漳州人那樣的更能統籌資源的大型會館）。即使如此，儘管大家都同意成立這樣一個比既有會館更高階的組織，但總會之所以得以成立，胡文虎還是扮演了關鍵性的臨門一腳。湯湘霖在〈本會十年史略〉中提到，總會成立後，後續的募款卻不甚理想，一直到1926年，獲得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贊助，會館大樓才得以動土開工。而即使大樓建好，預計會務開展的五大項目：辦學、文化（圖書館、出版日報）、體育（球場）、娛樂（休閒設施）、招待等，其所需金錢也籌不出來。一直要到1935年，由胡文虎等人擔任領導幹部之後才獲得解決，「胡文虎先生昆仲，獨捐鉅資，創辦民眾義務學校」。20年代的新加坡客家人捐款如此不甚理想，筆者認為一個原因是客家意識並不高昂。

其實胡文虎對南洋客屬總會的影響並不只是在金錢財物上而已，更在於對「客屬」這個概念的提出與改造。剛剛說到，事實上原本客屬總會的成立過程就跟一般華人會館的概念一樣，只是一個更大的地域性人群的凝聚而已。但胡文虎對於「客屬人士」的概念想像，並不僅只是一個地域性人群概念。十週年的紀念《特刊》上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胡文虎

的〈本會十週年紀念遊藝籌賑祖國難民大會宣言〉。胡文虎一開始便感嘆：「……在今日檢討這十年的過程，我們在總會領導下，對於宣傳僑屬、組織僑屬、改善僑屬、救濟僑屬等任務，雖有些部分已經做到，然而精神渙散、自我觀念、**地方色彩**，這一切的黑影，還籠罩著少數人的身心，因此，團結合作的精神，也就不十分充實…」（重點字為筆者所強調）。胡文虎期盼從客屬總會能摒棄自我中心，從堅固「吾屬」的小團結，進而擴大到「祖國」的大團結。

如果意欲摒除「地方色彩」，那麼，胡文虎本人對於「客屬」（客家人）這個人群分類的想像是什麼呢？《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的最後面附錄了幾篇在週年紀念之前各新加坡星系報紙相關的社論作為「論著」，除陳嘉庚集團的《南洋商報》的社論以外，應該可以視為能代表胡文虎本人的想法。分別是：〈胡文虎先生之宏願〉（1938.12.4，《星洲日報》社論）、〈客家精神論〉（胡文虎，1938.11.29，《星洲日報》）、〈客屬團結與民族團結〉（1940.8.23，《星洲日報》社論）、〈客人與客屬代表大會〉（1939.8.23，《星檳日報》社論）、〈所望於客屬大會代表者〉（1939.8.24，《南洋商報》社論），共四篇文章。（按，《特刊》收錄的這些社論文章不知為何並沒有按日期先後排列，而原本出處所引日期均為民國紀元，筆者為文章統一自行改為西元紀年。）

按發表時間先後來看，1938年11月29日的〈客家精神論〉從其第一段內容來看，是為了配合宣揚客屬總會到南洋各地成立分會的號召而作。因為到南洋各地成立客屬分會，「此議原為鄙人（胡文虎）所提出」，「故今當開始進行之際，鄙人爰就吾人傳統的客家精神，申述其略，已告本屬兄弟…」（《特刊》：92）。接著，胡文虎闡述了「客屬

系出中原，為漢族之嫡裔」，然後自唐末避亂而開始南下遷移，或被稱「客籍」，或被稱「客家」，或被稱「客屬」。客屬人士不只輾轉遷移於華南各地，「同時更繁衍於英荷暹緬越屬」。但是無論如何，「客屬之在中國民族之下，乃不能不嚴然**自成一系**矣」（重點為筆者所強調）。自成一系的基礎在於，「吾客屬人士，本於其先天的遺傳，長具有如下之特徵：「所謂客家精神者，不外為刻苦精神，勇武精神，奮鬥精神，團結精神，冒險精神的結晶體」。在胡文虎的詮釋下，客家人／客屬之所可以成為自成一個「民系」的分類，其內涵並不建立在一個固定範圍內的地域性人群分類，而是在於一個「先天可遺傳」的「精神特質」上。作為一個並不具固定地域屬性的客家人，客屬民系的特徵在於移民過程所展現的「精神特質」。

在《特刊》收錄的另外三篇社論中，胡文虎藉由星報的論述說明他之所以提倡客家精神論，絕不在標榜立異，另立幫會組織：「胡文虎先生……向不以省籍地域之偏狹的見解自限」，他的慈善義舉遍及南京、上海、廣州等地，國內與國外，並不限於閩省，「本來所謂客屬者，不過漢人中的一支，與一般漢族同胞，同其原祖，故無自外於他屬之必要，特以其語言關係，自趨於聲應氣求之勢，因而為便於團結起見，亦正不妨因勢利導而使成為國民中之一種總組織，與其他以職業志趣等為分野之組織，大略相同。果能運用得宜，自未嘗不可杜其流弊而收其良效」，「自本埠客屬總會成立，更以奠定統一南洋各屬客幫團結之良基，特以主持諸人，初無憑藉團體以營謀任何利益之心，故未積極為組織之工作。今胡氏…挺身而出，以謀團結南洋各屬客幫弟兄，為有組織有系統之行動，以圖增大其致力於國家民族及同僑社會之各種偉大切實工

作之效率，其心胸至為光明…」（〈胡文虎先生之宏願〉，1938.12.4，
《星洲日報》社論）。胡文虎以愛國愛鄉的民族團結論述來證成其組織
南洋客屬總會的光明磊落。在另外一篇社論中，他則提出另一個緩和的
說法。

「**客人**雖成一名詞，並無區別之意味：客人之對非客人，非客
人之對於客人，亦不應有區別之意見」（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那麼，為什麼又要盛大召開客屬代表大會呢？社論的回答很妙：

「蓋個人在社會之中，有種種交錯中之**關（係）**：如區域，則
曰某處人，如職業，則曰某界人，如學歷，則曰某校出身，
如政治主張，則曰某黨人，每一個人，可分隸於**各種關係**，而
所以為之結合者，則其中有一共同之點，就此共同之點中，而
謀內部之**互助**，及**集結其力量**，以謀各種關係中之**合作**，……
無論為地域、為職業、為黨派、可以為損，亦可以為益，
事在人為，為在善用之耳」。〈〈客人與客屬代表大會〉，
1939.8.23，《星檳日報》社論，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至於陳嘉庚的《南洋商報》社論可以代表福建幫群的看法，他們同
意客家人這樣的人群分類有意義，也同意客家人是漢人中原正統的嫡
裔，「這是現代中外研究東方民族的學者所公認的」，但也呼籲在國難
當頭的時刻，更要大力秉持客家精神來投入團結救國的行為（〈所望於

客屬大會代表者）（1939.8.24，《南洋商報》社論）。

從這些社論的寫作中可以看到，「客家人」這個華人內部的人群分類觀念在當時的海外南洋華人社會中，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儘管有聲類相似的客家話存在，但畢竟當時的幫群分法還是以祖籍地域為主，除了知識份子，一般身處於移民社會中下層的客籍移工，事實上很難有一種超地域的客家意識。並且，在人聲雜處、四方移民混居的南洋華人社會中，號召一種新的客屬集團分類，不免會引來緊張。因此胡文虎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地域、職業、黨派、語言等等的人群分法中解釋為什麼要進行「客屬」的組織與分法。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如果南洋的客家意識是由胡文虎所引發與發揚，那麼胡文虎的客家意識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學界對這個歷史過程還很少有研究。據楊君、楊瑞虹（2008）的說法，早在1921年，當胡文虎在香港開設第一家「永安堂」分堂時，他就加入了與當地客家社會名流人士所欲籌組的「香港崇正總會」的籌備活動中了。他不只捐了兩萬元，並在1928年還當選了香港崇正總會的會長，繼而被授與了「永遠的名譽會長」頭銜。（不過楊君、楊瑞虹在這篇文章中並沒有引用歷史資料佐證，所以這個說法有待進一步檢驗。）筆者認為，可以做大致的推論如下：胡文虎的政商人際網絡使他認識了像羅香林與創立香港崇正總會那群「客家知識份子」，因此在受影響之下，反應敏銳機靈的他，將羅香林等人的客家論述帶到新加坡，並捐錢成立南洋客屬總會，以此來進行整個南洋海外華人中客家團結的號召動員力量。細看總會的成立過程便可以看到胡文虎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19世紀末，當西方傳教士開始將客家人作為一個族群加以區分出

來並研究之後，客家人的獨特精神氣質便是一個論述的重點，並成為「客家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內涵，仔細看胡文虎的客家精神的論述內涵，可以說繼承了羅香林 1933 年發表的《客家研究導論》的內涵，並加以個人的「彈性」改造，因此可以視之為羅香林論述的（南洋）海外版。⁸ 胡文虎把它運用於南洋海外華人的情境以及個人的企業家形象加以詮釋，並進一步鑲嵌於當時如火如荼的「華僑救國」的運動之中，例如他說：「而此（客家）諸種精神者，實為人生欲圖創立偉大事業者所必需，而尤以當此國難嚴重時期，凡我皇帝子孫，有志於復興民族挽救國家者，所迫切需要，然則吾客人之客家精神，及擴而大之，使成為中華民族之精神可也。或善運用之，使成為救國精神，亦無不可也」（〈客家精神論〉，《特刊》:92）。

最後，胡文虎所詮釋的客家精神是不是有其經濟網絡關係的「彈性」文化詮釋之用意？筆者認為這就是新加坡客家一開始存在便具有的特徵所在。前面引述的十週年紀念社論中所謂的「集結其力量，以謀各種關係中之合作」，以及「事在人為，為在善用之耳」…等等，這樣的自我辯解正好符合了王愛華關於海外華人的「彈性」（公民權）「關

8 關於羅香林的客家論述源流，參考林正慧（2015）、施添福（2014）其來源可追溯到最早一批西方傳教士與人類學家在粵東地區對客家人的研究論述。受太平天國的影響，這些西方人對於客家人懷有一種特別的想像。而在清末民初與廣東人的論戰中，客家原鄉地區的知識份子援用這些論述形成了客家人的論述。羅香林於 1933（1992）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導論》特別專闢一章來論述幾點客家人的特殊特性：1. 客家人一般過著大家庭的生活，並且每個家庭內很注重將人力資源分散到各行各業；2. 客家人重視婦女的能力與地位；3. 客家人勤勞與愛整潔；4. 客家人（男子）好動（指離鄉活動）並具有野心；5. 客家人具冒險與進取精神；6. 簡樸與質直；7. 剛愎與自用。羅香林對於客家人的這幾個特點，除了依據自己的實際觀察與生活經驗之外，有學者也認為是受到 19 世紀第一位以民族學方式進行客家研究的傳教士歐德理（E.J. Eitel, 1838-1908）的影響。歐德理把客家人與鄰居兩個人群（廣東人與福佬人）加以比較後，指出了幾個客家人的特性：1. 客家較不熱衷於偶像崇拜，客家比較重視祖先崇拜，因此在客家地區祖祠重於廟宇；2. 客家人與廣東或福佬人比起來，是個最愛唱山歌民謠的種族，不論是工作、休閒，或悲歡、離合皆能以歌來表達情緒；3. 客家人雖普遍貧窮，但富有反抗精神；4. 重視教育；5. 刻苦耐勞以及工藝技術優良；6. 客家婦女比較過著自然自由的生活，但跟廣東婦女比起來卻比較沒教養與不那麼整潔乾淨。（施添福 2014：68-70）

係」論點，其實早在 30 年代的胡文虎這樣的海外華人企業家中就已經開始實踐了。而胡文虎將羅香林等的客家論述加以移植到海外南洋，並加上「創業精神」等的客家精神論，更顯示了關於「華人（性）」的彈性文化詮釋的典型表現。我們可以用胡文虎在客家精神之外的幾個例子，來顯示這種海外華人的「華人（性）」彈性文化詮釋如何在 30 年代服務於或鑲嵌於一種跨國商業資本的政商網絡建構之中。依沈儀婷（2013）對星系報業的新聞網絡與永安堂虎標藥品的商業網絡加以分析指出，「胡文虎擅長建立跨區域的網絡」，胡文虎的企業關係開始擴大的過程起自 20 世紀初的「國貨」運動，運用這個局勢，胡文虎因此積極的將自己的永安堂塑造成一個「國貨」（事實上那時他公司註冊之地是隸屬英國），而他本人是一個勇於捐款，大筆投入慈善行動的「愛國商人」。他因此成功的打入上海商界與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高層。從 20 年代到 50 年代，胡文虎的星報系列分別在下列城市中發行報紙：新加坡、汕頭、廈門、廣州、香港、檳城、福州、曼谷。藉著跨國與跨域的報紙和大眾文化（沈儀婷 2013；衣若芬 2015），在這些報紙上，胡文虎的虎標藥材廣告，大量的連結與運用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現代化運動素材，例如「體育強身精神」、「增強企業競爭能力精神」，以及「抓緊時代動脈」等等的修辭，將其類比於他的藥材可以治癒的中國（作為國體的身體）。沈以胡文虎刊登自己的泳裝照片指出，「這似乎在暗示著其健康強壯的體魄、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逆流而上的奮鬥精神。這個意象不只是將個人與家庭幸福聯繫在一起，甚至於與整個民族與國家的命運前途息息相關」（沈儀婷 2013：224）。例如，他的《星報》系列報紙之所以取名為「星」，主要是著眼於「如同指南針指引人民與國

家行在正途上」。因此，胡文虎的慈善公益贊助、體育贊助、衛生醫療、新聞傳播、文化教育、經濟建設，乃至大眾文化等等，無不沈浸與鑲嵌於當時積弱振奮、救亡圖存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時代氛圍之中，「乘著時代的巨浪，胡文虎滿足當代人的心理需求——藉著虎標藥品緩解他們的痛苦，藉著星系報業滿足他們對於祖國訊息的渴求，藉著廣告中的故事帶給他們希望與追逐夢想的動力。虎標藥品無所不醫的宣稱……成為 20 世紀上半葉的一道獨特風景」（沈儀婷 2013：258）。

四、「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對客家文化的第二次詮釋

在本節中，筆者要藉由新聞、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年度發行的會刊與特刊，以及筆者親自走訪的觀察為基礎，來論述當前新加坡客家文化復興運動的特性。筆者將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印行的《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2009）以及三期《客總會訊》（2013，2014，2015）為主要材料，來分析近年來新加坡的客家文化，如何在一個新的時期進行一個跨國連結的客家文化詮釋。這四本刊物的內容恰好對於南洋客屬總會自 2000 年以來（大約到 2015）所進行的跨國交流、客家文化活動、以及客家學術研討等活動，有一個連貫性的大事紀方式的記載。而記載相關活動的文字中也都會提到相關客屬社團（如茶陽會館）的參與動態。對於分析 2000 年以來新加坡客家的相關活動非常具有參考性。另外，關於南洋客屬總會於 80 年代在新加坡政府的主導下所進行的一系列文化轉型的活動則可以參考王力堅（2012）研究，他集

中分析了南洋客屬總會在新加坡獨立後的沈寂狀態，以及在 80 年代隨著新加坡政府主導的「儒家運動」、「說華語運動」等的文化轉向向下重新復甦活力的過程。而本文所分析的則主要集中在 2000 年之後的活動，至於中間的 90 年代則有待後續的相關研究。

為了顯示這時期新加坡客家的文化復興活力以及其跨國網絡連結的特性，讓我們來看兩個場景：

場景一

這裡，我們重複一下一開頭引言的 2008 年的 10 月 3 日到 5 日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慶祝成立 150 週年大會的場景，並作進一步的後續報導來鋪陳本節對於新加坡客家社會對於什麼是「客家文化」的文化詮釋。以下引用一篇來自受邀參與者江彥震（「世界客屬總會會長」辦公室主任）發表於「《世界客報》部落格」網站的報導文章來大致呈現這次的慶祝活動內容。首先，這次的慶典主題是：「心系家園·志向四方」。可以看到作為客家社團之一的茶陽會館，在慶典主題的立意上，有意呈現既以新加坡作為「家園」，又試圖凸顯作為海外客家移墾歷史的「拓展四方」精神。而從邀請的來賓就可以看到茶陽會館「連結四方客屬」的盛大陣容。與會來賓除了地主貴賓新加坡總理也是茶陽會館榮譽顧問的李顯龍之外，重要貴賓還有「中國駐新加坡大使張小康、梅州市書記與常委李純德、梅州市政府副市長陳衛平、縣書記丘小宏、縣長謝志雲、大埔縣委、大埔縣政府代表團、大埔鄉親……等人」。來自台灣的則有「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劉盛良率領的代表團 13 人……再加上世界各地客屬相關團體，這次慶祝大會邀請的來賓總共高達 1,600 多人（《世界客報》（*The World Hakka Report*），2014）。⁹

9 《世界客報》（*The World Hakka Report*），〈茶陽會館 150 周年慶〉江彥震。http://john380920.blogspot.tw/search?updated-min=2014-01-01T00:00:00-08:00&updated-max=2015-0

報導為了呈現新加坡兩代領導人不只都是客家人，而且都重視客家人的貢獻，因此特別把李顯龍的致詞與李光耀於 1991 年 2 月的致詞加以對比呈現。當時已經退居為資政的李光耀身兼茶陽（大埔）會館榮譽顧問，1991 年受邀向新加坡宗鄉總會和中華總商會進行一場演講，他說道：

「新加坡成功的一場最強有力的因素，就是 50—70 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價值觀。由於他們的成長背景，他們肯為家庭和社會犧牲。他們也有勤勞簡樸和履行義務的美德。這些文化價值觀幫助我們成功……」（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然後十多年後的 2008 年 10 月，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舉行成立 150 週年慶祝活動上，總理李顯龍（李光耀之子）強調：

「勇於開拓，善於適應」是客家人的特性，『四海為家，冒險進取，敬祖睦宗，愛國愛鄉』則是客家人的族群精神……在政治領導人中，除了李光耀資政之外，好幾位前任部長也都是客家人，包括韓瑞生、胡賜道、侯永昌和李炯才，以及我，他們對國家的發展做出很大的貢獻」（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茶陽會館最近售賣產業後獲得一億多元的資金……，我建議會館考慮支持一些重要的文教活動，特別是那些能夠激發學生對華族文化和語文興趣的活動，例如資助學校添購華文書籍，

或者贊助學生觀賞華族文化演出，……在族群文化傳承方面，本地客家社群所面對的困難不小，這跟整個華社所面對的情況一樣」。

他以茶陽會館的中英雙語網站和豐永大公會的『客家先賢文化紀念館』為例子，鼓勵華社以「更活潑生動的方式**呈現傳統文化**，讓年輕一代覺得容易親近。」（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根據《客報》該文的報導與描述：在慶祝 150 週年的活動之前，為了迎接這次的 150 年慶，「在 2008 年 6 月到 9 月，茶陽會館聯合 19 個客屬會館團體舉辦了『客家文化節』，以開拓國人眼界，讓新加坡其他族群更加瞭解客家文化。此活動引請熱烈迴響，並因此成功籌款一筆金錢來贊助三家中醫院的設立」。該文寫道：「近年來茶陽會館活動頻繁，不斷吸納新會員，啟動多元文化節目。開創客家歌曲傳唱，掀起熱潮，在短短三年內，使得幾近絕跡的客家歌曲傳遍四方，大眾津津樂道。客家文化研究室成立，出版論文集，舉辦文化座談會，積極推動客家文化，成績顯著」，「茶陽會館稟承中華文化優良傳統，走在時代前端，形象鮮明開放，會務蓬勃發展，成為新加坡最活躍的華社團體之一」。

場景二

依據南洋客數總會發行的《慶祝八十週年紀念特刊》上的一篇年度重要活動報導：「2009 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梅州·世界客商大會』在世界客都—梅州隆重舉行。全球 21 個國家和地區，中國的 14 個省（市、自治區）的 1500 多名客商菁英、卓越經營者、學者專家等出席了大會。與會者通過這個盛會，凝聚智慧、交流經驗，共謀世界客屬

地區的合作發展」。《慶祝八十週年紀念特刊》是一本印刷極為精緻、硬裝書皮、16開本的特刊。依據內文所述，「2009 梅州·世界客商大會」是由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人民政府首倡，由世界各地 74 個知名的客屬團體（商會）和 84 個具有影響力的客屬商界人士共同發起，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新加坡應和會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是倡議發起單位之一，而客屬總會會長、劉智評副會長和賴涯橋副教授為倡議發起人之一。「2009 梅州·世界客商大會」，以「崇尚論道、彰顯卓越、**聯誼合作、共謀發展**」為宗旨，以「**全球客屬商業菁英匯集，和世界客屬地區合作發展的盛會**」定位，以「**世界性、客屬性、工商性**」為特質，著力於建構客屬地區之間、客商之間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弘揚**客商精神**，展示客商風采，促進共同發展」（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該文並且強調，「2009 梅州·世界客商大會」創立的定位和 1971 年創立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有著不同的性質：「前者（按，應是指「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強調的是『團結、友誼』，強調的是『鄉情』；後者（按，指的是「梅州·世界客商大會」）則凸出『商情』，是全世界客商及商會之間的合作交流的平台。整體而言，懇親大會是全世界客家鄉親的大聚會，而客商大會則是全世界客屬商界精英匯集的盛會。另者，在命名上，客商與地域性的晉商、徽商、潮商、浙商等有所不同，是以民系命名，以文化為紐帶。……同時，客商具有濃厚的儒商色彩，客商亦稱為『儒商』。客屬商界人士大多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徵，崇尚詩禮傳家，崇尚節儉，完整保存了客家人的獨特語言和生活習俗。客商一般『商味』並不濃」等等。正如客商大會倡議書所言：「客家是世界上著名的大遷移民系之一，以獨特的遷移歷史，堅韌的進取精神，執

著的鄉土情懷，成為一個舉世矚目的強大民系。千百年來，勤勞勇敢的客家人，在世界各地拓荒開埠，建基立業，勤奮拼搏，銳意進取，湧現了一批又一批事業有成的客商和客屬團體。客商組織迅速發展，客商事業不斷興旺，全球影響力越來越大」（《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2009）。

當然，這些文字與各式各樣新成立的客家組織，明顯的是中國（地方）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招商策略而已。從特刊該文所附的照片來看，「2009 梅州·世界客商大會」在 10 月 12 日舉辦剪綵儀式之後，13 日的會場改佈置成「2009 世界客商名優產品展銷會暨項目簽約儀式」，主辦者是「2009 梅州·世界客商籌備會」，參展的地區有：香港、台灣、印尼、馬來西亞、美國、龍岩、贛州、三明、漳州、泉州、廈門、北京、南寧、海口、廣州、深圳、汕頭、梅州……等等（引自照片中的大會獎台布幕文字）。從事後回顧來看，這個服務於招商投資性質的「梅州·世界客商大會」顯然並沒有發展到像世界客屬懇親大會那樣成為一個常態性、國際性與知名性的跨國客家組織。然而，不管其直接具體的目的為何，作為合作首要發起人之一的南洋客屬總會，這個場景事實上非常能具體而微地凸顯出本文所要論述的新加坡客家文化特性，也就是其「跨國關係網絡—跨域資本流動—（華人）文化詮釋」，這三者的共構相互鑲嵌的特性。

接下來，本文將利用當時身為南洋客屬總會的副會長賴涯橋教授在《八十年紀念特刊》上的文章來與上一節 30 年代胡文虎論述的「南洋客家」的論述做比較。進而以凸顯出新加坡客家在 21 世紀對於客家文化的彈性詮釋，所具有的更明顯商業性與跨國性關係連結的特性（雖然

這個跨國連結主要還是與中國的連結為主)。時任客屬總會副會長的賴涯橋教授有多篇文章刊登在《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中。首先，關於會館的未來發展與角色扮演上，在一篇談到未來新加坡客家會館與社團的展望時，他鑑於新加坡在語言、會館義塚與國家意識(國民認同)等面向已經有不可改變的新現實，他建議會館未來的創新發展要更多的投入在客家文化保存發揚與客家研究上，「在全球化經濟發展的今天，客家人應該稟持強韌不拔的開拓精神，變革求新的意念，在不忘本身是客家人的同時，放眼世界，積極融入到各所在地的經濟文化中磨練自己，進而影響周圍全體，建立起強大的客家文化藝術和經濟圈，為國家社會創造財富，並增值自己的事業。」接著，在特刊的另一篇文章中，他詮釋了客屬會館的徽章——梅花——的意義，梅花的徽章源自客家原鄉梅州，而梅州的梅花精神是「不屈不撓的骨氣與清氣」，他希望在賦予新的詮釋下，新加坡的客家會館能秉持這精神，進而「影響客家人在利益相關之間講求誠信和互惠互利，在事業經營和日常生活中能奮勇當先創造價值」(重點為筆者所強調)。而在八十週年紀念特刊的第三篇文章中，賴涯橋接著介紹了南洋客屬總會率團參加廣東梅州的「世界客商會館」的開工暨「歸讀公園」的落成剪綵儀式(這兩座建築物都有新加坡各個客家會館的捐款參與)。最後，第四篇文章標題是〈客家動力與梅州的社會轉型〉，文章大略的談論梅州的未來經濟發展方向與客家文化的關聯，文章邊頁以大字體「摘要」出文章中的重點文句：「梅州有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蘊，可通過繼承、挖掘、提升客家文化，提高文化軟實力，服務於經濟世界的發展。此為經濟發展的王道，也是匯集全球客家人力量助推世界客都梅州加速崛起的捷徑」(重點為筆者

所強調)。

印刷特別精美厚重的《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可以視為是總會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品，因此這樣的編輯政策事實上可以很精確的反應出新加坡客家文化的特性，具有典型王愛華所分析的海外華人關於「華人(文化)」的詮釋如何深深的鑲嵌在跨國經濟網絡的建構之上，從而可以視需要加以不斷的重新彈性詮釋。

接著，除了上述的客家文化的彈性詮釋分析之外，本文依南洋客屬總會發行的《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2009)以及《客總會訊》(2013 第 59 期、2014 第 60 期〔紀念特刊〕、2015 第 61 期)中所刊載的客屬總會歷年活動事紀，來呈現客屬總會與新加坡客家會館「跨國性連結」的大致輪廓。儘管可能有些重要的活動與連結關係可能不會在這些公開的會訊行事曆中被報導或呈現。但是將這本客總會刊物的活動事紀加以彙整的話，則剛好是從 2000 年到 2015 的歷年活動總成，因此可以提供一個會館 15 年來對外跨國連結的大致情形。而且編輯者剛好也依「文藝／文化活動」、「接待拜訪」、「學術」等屬性加以分類，因此也可以用以分析客屬總會的主要活動形式的類別屬性。以下各表是筆者依據 2000-2015 年的活動事紀內容自行加以分類與統計，儘管每期的分法不太固定，但筆者可以依照文字所述的活動內容判斷分類，以呈現總會主要的活動屬性為何，以及主要連結交流的對象為何的一個大致趨勢走向。而整個完整的活動大事紀則作為附錄於本文最後，讀者可以自行參閱。

表 1 2000 年至 2015 年的跨國互動

(含接待、拜訪、文藝與學術等各式活動)

	台灣	中國	馬來西亞	印尼	港澳	其他(註明國名)
次數	19	97	23	3	2	韓國 1 夏威夷 1

資料來源：整理自《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

從表 1 可以看到，南洋客屬總會 2000 年至 2015 年以來，跨國交流與連結的對象是以中國為主，其交流次數比其他國家與地區交流的總和還要更多。

表 2 2000 年至 2015 年的活動內容比較

	政府機構	招商 / 商務	文藝表演	祭祖	各國客家社團交流	學術活動	其他
次數	49	12	38	1	44	10	1

資料來源：整理自《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

從表 2 可以看到，南洋客屬總會的交流活動中，與「政府機構」的往來占最多，而雖然「招商 / 商務」才占 12 次，但如果考慮到活動分類的困難與模糊性（「各國客家社團交流」這項目中其實也含有政治性與商業性），我們可以看到南洋客屬總會的例行正式活動中，事實上政治 — 商業的連結是最多、最主要的活動。壓倒性地比文化交流更多。

表 3 2000 年至 2015 年與中國互動交流的模式比較

	政府官方	招商 / 商務	文藝表演	祭祖	各客家社團交流	學術活動	其他
次數	42	11	16	1	23	4	0

資料來源：整理自《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

從表 3 可以看到，南洋客屬總會在與中國的交流中，政府機構的往來與各種招商獨佔最大多數，遠遠高於文化活動、祭祖與學術交流。這充分顯現了與中國的跨國連結主要是建立在「跨國政經關係」的構作上。這也顯示了新加坡客家的發展與中國經濟崛起息息相關。

表 4 2000 年至 2015 年與中國各政府機構互動交流的模式比較

	中央部會	福建省	廣東省	江西省	河南省	其他
次數	9	14	52	1	8	14

資料來源：整理自《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

而從表 4 中則可以看到，在與中國的互動中，廣東與福建占最多次數，這顯示了互動對象與客家原鄉的地區高度重疊。但河南省的次數遠高於福、廣兩省以外的省份（江西只有一次），則充分顯示客家論述中的「中原衣冠正統」的血緣系譜依然在新加坡客家意識中佔很重要的份量。而中國也充分利用這點進行海外華人的關係連結。

表 5 2000 年至 2015 年客家文藝活動最常採取的類型

	唱歌	展覽	座談會 / 演講	書畫展	跳舞	其他
次數	23	1	7	0	0	5

資料來源：整理自《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

表 5 顯示了新加坡客家對於客家文化的詮釋、再現與推廣，主要仍然以「唱歌」的形式進行。假如與台灣客家文化表現形式相比較的話，則顯得比較單調與不具多元性，仍以傳統的客家山歌為主要元素。

綜合以上的活動概覽，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個粗略的結論：作為新

加坡客家社團的代表，南洋客屬公會在近 15 年來的活動，主要是在與中國建立一個跨國的政治——經濟關係網絡平台，關於客家文化與教育推廣反而是居於次要的地位。當然，限於文長與資料取得，我們無法得知在「中國—新加坡」的跨國連結中，是何者採取的「主動」比較多還是「被動」回應比較多。

五、結論：在跨國連結中生成的彈性客家

王愛華以自己在 1990 年代時，曾以馬來西亞華人身份到中國拜訪的經驗指出，政治菁英不斷強調海外華人與中國之間在文化、血緣上的紐帶緊密結合，其實無非只是服務於中國經濟發展與資本積累的需要而已，而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彈性／靈活」的挪用祖國意識與傳統文化便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詮釋與生產的過程。本文前面也曾引用王愛華的觀點指出：海外華人的中華文化認同並不是建立在有一個「明確的文化實體」上，而其實是建立在一個「多重的跨國關係網絡」之中。商人、政治人物、留學生、觀光客、勞工…等等，不同的華人隨著身處全球資本運轉的不同位置與關係，形成了多樣的「華人（性）」（Chineseness）與不一樣程度的文化認同。唯有從文化政治與政治經濟學的合構，才能進一步深層的去分析海外華人的跨國流動、民族國家與文化實踐之間的關係。

本文對新加坡客家社團（以南洋客屬總會為主）的活動與客家論述所進行的分析顯示，其實不管上個世紀的 30 年代還是這個世紀的近 15 年來，新加坡的客家論述似乎證明了王愛華所說的，海外華人在面對中

國經濟崛起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中，對於經濟理性與公民權（公民認同）的策略選擇事實上離不開對「華人（文化）」的彈性文化詮釋。

新加坡作為一個必須吸引全球資本匯集的商業城市國家，這似乎是她不得不然的命運（李光耀 2001），這樣的國家處境與性格，因此也深深的烙印在新加坡的客家文化發展上。新加坡沒有廣大的土地可以形成一個客家聚落／社區，而全球化的商業競爭力使得她必須掌握英語與中文而犧牲方言（包含客家話），而且殖民地的歷史與身處海外華人少數的處境，更不可能讓新加坡保有任何純粹的傳統客家文化元素。研究香港客家的人類學學者 Nicole Constable（1996）在其主編的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一書中，就強調客家認同的樣貌有著廣泛的政治、社會背景因素，以及個人獨特的意義脈絡。她強調了客家認同的社會學式文化建構過程：「客家」並不是一個本質不變、或有或無的存在。從這個角度來看，在自由貿易港的殖民政策治理下，早在上個世紀的 30 年代，華人大企業家、黨派政治活動者、各種社團組織、各式公司行號、華人新聞媒體、大眾文化與消費品、一批批南來的移工與返鄉者…等等，這些人流伴隨著各式各樣的政治意識，交叉在民族認同、資本流動、離散文化，以及人際多重網絡的現代性中相互鑲嵌，新加坡的客家意識就誕生這樣的背景之下而形成其獨特的（客家）性格。

謝誌：本文為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的成果。計畫名稱為：「族群想像與客家網絡的建構——台灣經驗的角色」（總計畫名稱：「全球客家形成的研究——台灣經驗與多層次想像的浮現」，計畫編號：NSC-

103-2420-H-009-001-MY2)。筆者感謝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黃賢強老師的接待、受訪與贈送多本著作；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的接待與受訪，並贈送《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復刻版）、《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客總會訊》等多本書刊；以及茶陽（大埔）會館的會長及理監事幹部們抽空接受本人的訪談與熱情接待，以上在此一併致謝。並特別感謝茶陽會館文物室何炳彪主任的接待導覽與贈送珍貴難得的《新加坡華人通史》。作者也感謝兩位審查者給予文章修改方向的建議，本文已按建議的方向進行修改。

參考文獻

- 王力堅，2012，《新加坡客家會館與文化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客家文化研究室、八方文化創作室。
-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社。
- 衣若芬，2015，〈「文圖學」與東亞文化：1920-30 年代虎標永安堂藥品的報紙廣告〉。《臺大東亞文化研究》3：161—195。
- 何炳彪，2014，〈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暨文物館簡介〉。《全球客家研究》3：373-380。
- 李小燕，2007，〈新加坡客家移民史與移民經驗〉。頁 11-26，收錄於黃賢強編，《新加坡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李光耀（訪談稿），2011，《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韓福光、朱萊達、蔡美芬、林惠敏、劉意慶、林悅忻、陳子敬。

新加坡：Straits Times Press。

汪芳紅等，2007，〈新加坡客家會館〉（下篇）。頁 49-69，收錄於黃賢強編，《新加坡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沈儀婷，2007，〈客家人的文化企業：胡文虎的星系報業研究〉。頁 112-126，收錄於黃賢強編，《新加坡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_____，2013，《譜寫虎標傳奇：胡文虎及其創業文化史》。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創作室。

林正慧，2015，〈第二章 華南客家的形塑歷程〉。頁 23-137，收錄於林正慧著，《台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林孝勝，2015，〈神權、紳權、幫權〉。《新加坡華人通史》第二章。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南洋客屬總會，1939，《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復刻版）。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

_____，2009，《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

_____，2013，《客總會訊》。8月，第 59 期。

_____，2014，《客總會訊》。8月，第 60 期。

_____，2015，《客總會訊》（紀念特刊）。6月，第 61 期。

施添福，2014，〈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 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2：1-114。

柯朝欽，2015，〈臺灣客家現代族群想像的三種類型：民族認同、公民

- 權利以及認知框架〉。《全球客家研究》5：149-192。
- 崔貴強，2015，〈乘風破浪下南洋：早期華族移民浪潮〉。《新加坡華人通史》第二章。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 張容嘉，2014，〈客家群體的形成：胡文虎與其客家社團〉。《客家研究》7(1)：195-220。
- 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十四號）。
- 黃淑玲、利亮時，2011，〈共進與分途：二戰後新馬客家會館的發展比較〉。頁 87-104，收錄於蕭新煌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黃賢強，2011，〈族群、歷史、田野：一個客家集團的跨域研究〉。頁 55-70，黃賢強主編，《族群、歷史與文化：跨域研究東南亞與東亞》（上／下冊）。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創作室。
- 楊君、楊瑞虹，2008，〈海外客家華人的思想演變：從族群認同到民族國家意識〉。《江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18(2)：73-74。
- 劉宏，2000，〈東南亞華人社團與跨國社會和商業網絡：兼論客屬與非客屬之異同〉。頁 379-399，收於徐正光主編，《歷史與社會經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劉宏、張慧梅，2007，〈原生性認同、祖籍地聯繫與跨國網絡的建構：二次大戰後新馬客家人與潮州人社群之比較研究〉。頁 307-328，收錄於丘昌泰、蕭新煌主編，《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台

- 灣與全球的經驗》。台北：中央大學出版中心、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薛莉清，2015，《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謝國斌，2013，〈新加坡的族群政治〉。《台灣國際研究季刊》9(1)：33-58。
- 羅香林，1992（1933），《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
- Constable, Nicole, 1996, 'Introduction: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Hakka?' Pp. 3-35 in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edited by Nicole Constabl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Ong, Aihwa, 1997,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Ong, Aihwa, and Donald M. Nonini, eds., 1997, *Ungrounded Empires :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 Routledge.
- Wee, Vivienne, and Chan Yuk Wah, 2006, "Ethnicity and Capital: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6(3): 328-349.

附錄 2000-2015 年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活動彙整

附錄 1 2000-2009 南洋客屬總會屬下華樂、漢樂、合唱、山歌團演出活動

2000.5.1	華樂團假維多利亞音樂廳主辦「千禧樂韻」音樂晚會。
2001.11.25	華樂團於新加坡大會堂呈現「絲竹樂韻」華樂演奏會。
2004.10.31	為配合本會成立 75 周年紀念，華樂團、合唱團、漢樂團假新加坡大會堂聯合呈現「弦歌漢韻」文娛演出。
2005.11.6	華樂團、合唱團、漢樂團在維多利亞音樂廳為防止家庭暴力中心 (PAVE) 作慈善募款演出。
2006.12.29	華樂團及漢樂團於維多利亞音樂廳聯合呈現「石叻弦韻」音樂演奏會。
2007.3.9	新山柔佛古廟眾神行宮活動，山歌團應邀出席參與演出。
2007.4.27-29	配合年度新加坡華族文化節，山歌團聯合芳林聯絡所在芳林公園大舞台舉辦「戲曲山歌滿芳林」。
2007.12.16	怡保三德中學華樂團師生共 45 人到本會與華樂團進行交流演出。
2008.2.26	本會以及各屬團客家山歌團受邀，參與柔佛古廟眾神行宮活動山歌演出。
2008.3.15	聯同芳林公園民眾聯絡所主辦「新馬客家歌曲之夜」。
2008.8.2	本月合唱團參與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主辦的「愛國歌曲大家唱」的演出。
2008.8.30-9.5	本著文化交流與探索尋根的精神，華樂團在副會長胡裕初、文娛主任張振興、副主任黃偉強的率領下，一行 53 人途徑永定縣城下坑、下洋鎮、大埔縣、梅州市、豐順縣城湯坑、汕頭市澄梅區與潮陽區，作交流演出。
2008.9.6	聯合芳林公園民眾聯絡所舉辦第二屆『客家歌謠慶中秋晚會』，地點在雅柏廣場，參與演出團體包括多間會館的客家歌曲班。
2008.9.14	第一屆「客家山歌基礎培訓班」開課。
2008.12.21	舉行新馬台客家歌曲交流會，講員是台灣高雄客家鄉音樂團團長鍾榮富教授、吉隆坡山歌王丘惠中，及本會文娛主任張振興分別匯報三地客曲活動與發展概況。
2009.2.14	應新山客家公會之邀，山歌團出席新山春節游神會客家歌曲交流演唱會。
2009.3.21	與芳林公園民眾聯絡所聯辦「第三屆新馬客家歌曲之夜」。
2009.5.11	台灣中央研究院、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等學者到訪，華樂團專程呈現漢樂演奏歡迎嘉賓。
2009.8.12	台北縣東南亞客家藝文交流晚會「客家心·雙城情」於本會禮堂熱烈舉行，演員共 25 位。

資料來源：根據《南洋客屬總會八十週年紀念特刊》彙整。

附錄 2 2000-2009 南洋客屬總會海外懇親尋根、聯誼交流

2000.7.28-30	本會 12 名代表出席亞庇客家公會三慶大典。
2000.7.17	25 位鄉親出席福建省龍岩市召開的「世界客屬第 16 屆懇親大會」。
2001.6.22	會長劉再光出席山打根客家公會 115 周年慶慶。
2001.10.14	本會祝賀團到居鑾出席居鑾大埔同鄉會所開幕典禮。
2002.12.17	澳門崇正總會舉行成立大會，副會長劉佐熾、成立超出席會議。
2003.10.22-24	河南省鄭州市舉行第 18 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由楊雙標會長率領 32 名團員參與其盛。
2004.4.23	第四屆亞細安客屬懇親大會在汶萊首都斯里巴卡灣召開，顧問劉再光、副會長劉佐熾、饒尚仁、張家勝一同出席。
2004.6.13	本會聯同茶陽（大埔）會館鄉親到居鑾客家公會作交流聯誼。
2004.11.18-20	第 19 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贛州舉行，本會 29 名代表出席，團長：楊雙標會長。
2005.5.20-22	全球客家、崇正會聯合總會第三屆代表大會在沙巴亞庇市舉行，出席代表：顧問劉再光、副會長劉佐熾及張家勝。
2005.9.10	印尼大埔同鄉會成立 10 周年紀念慶典，會長：楊雙標、顧問劉再光等率團到會祝賀。
2006.10.27-31	第 21 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台北舉行，本會 2 名代表到會參加。
2006.11.19	何僑生會長代表 28 名鄉親出席中國福建省寧化石壁舉辦的第 12 屆「世界客屬石壁祖地祭祖大典」。
2006.12.12	新山客家公會慶祝創會 80 周年大慶，本會聯合 9 個屬團，共 89 名團員出席。
2007.12.2	本會組 32 人代表團拜訪新山客家公會與考察依斯干達經濟特區。
2008.10.16-18	何僑生會長、副會長、董事與家屬連袂出席中國陝西省西安市主辦的第 22 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2009.6.10-15	何僑生會長、顧問劉再光、副會長劉智評、賴涯橋教授、何南光、胡裕初、張振興及劉樹深一行人親赴梅州進行 6 天的南洋客屬總會 80 周年慶慶回鄉行。

資料來源：根據《南洋客屬總會八十週年紀念特刊》彙整。

附錄 3 2000-2009 南洋客屬總會接待到訪海内外代表團

2000.4.30	閩西客家聯誼會 9 人訪問團蒞臨。
2000.7.3	梅州市華僑博物館 5 位代表到訪。
2000.7.16	於本會禮堂設餞別宴熱烈歡送中國駐新加坡特命全權大使陳寶鏗暨夫婿石秉毅光榮回國。
2000.8.28	河南省客家聯誼會會長林雲梅率團到訪。
2000.10.16	「中國陝西皇帝陵基金會」訪問團蒞臨。
2000.10.19	亞細安客屬聯合總會會長吳能彬、署理主席拿督吳德芳、秘書長林濟升醫生，常委甲必丹鄧福恩一行 4 人到訪。
2000.10.21	副會長黃六輝率領惠州市代表團 28 人到訪。
2001.2.21	大埔縣政府代表團出席本會新春聯歡晚宴。
2001.3.5	中國駐新加坡大使張久桓閣下、參贊兼總領事黃曉健、秘書李洪、王晰寧來訪。
2001.11.30	台灣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副主任鍾福山、處長鍾萬梅、副處長黃崇烈一行 3 人到訪。
2002.1.14	本會聯同茶陽（大埔）會館設晚宴大埔縣長劉振桓、大埔縣人大主任劉維彬、大埔縣橋聯副主席劉真漢蒞臨。
2002.5.24	中國三明客家祖地懇親團 9 位代表到訪。
2002.9.3	廣東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副主任趙金陵和海外交流協會副秘書長趙升才，由新加坡廣東會館署理會長何國才帶領下到訪。
2002.11.12	閩西客家聯誼會 11 人代表團到訪。
2002.12.2	中國大埔、梅縣及馬來西亞鄉親一行 69 人來訪。
2003.8.4	揚州市海外交流協會會長楊敏等一行 3 人到總會進行交流。
2003.8.8	韓國大田大學文智成教授與賴涯橋副教授會晤並參閱客家人資料。
2003.9.19	揚州市經濟考察團 11 人由人大常委會主任王云程率領到訪。
2003.11.11	台灣中央通訊社多媒體新聞中心製作人倪瑞與柯榮發到府收集客家人資料及錄影。
2003.12.16	本會聯合茶陽（大埔）會館設歡迎晚宴招待中國大埔縣代表黃功鑒副縣長等人。
2004.1.1	山西呂梁民間藝術團 10 位團員到本會與華樂團進行交流。
2004.5.5	政府華設聯絡組 5 位國會議員由曾士生政務部長統領，於本會與董監事及屬團代表舉行對話會。
2004.6.19	台北市政府客家委員會專員梁銘旺、林偉忠來訪。
2004.6.22	中國大使張云閣下率領 5 位官員到訪。
2004.7.25	中國三明寧化客家祖地訪問團一行 8 人蒞臨。
2004.8.26	中華姓氏文化籌委會代表團由河南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董錦燕率領來訪。
2004.10.25	中國大埔縣委、縣政府 12 位領導蒞臨。
2005.1.14	台灣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羅文嘉伉儷、處長鍾萬梅、駐新加坡台北處代表烏元彥代表、副組長松申武，由鄉賢鍾仕達帶領到訪。

2005.4.26	中國大使館新任參贊兼總領事吳冬梅女士、參贊向山蒞臨與本會董監事作交流。
2005.6.2	四川省人民政府代表團 13 人由副省長黃小祥率領蒞臨。
2005.6.6	廣西賀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團 8 位、由賀州市政協副主席關遠芳女士帶領到訪。
2005.6.25	中國廣東省梅縣人民政府縣長駱裕根；副書記劉新生共 20 人到訪並匯報家鄉近年建設情況、宣傳投資環境。
2005.8.3	成都市何華章副市長率領「世界客屬第 20 屆懇親大會」代表團 11 人到訪。
2005.8.23	本會 76 周年慶慶，揚州市人民政府率領 6 位代表參與其盛。
2005.11.3	中國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李健民、招商局長吳即發、生物醫藥產業園管理辦公室主任葉韶華、永和製藥有限公司董事長符俊杰連袂蒞臨到訪。
2005.11.22	揚州高郵市市長徐祥華率領經濟考察團 6 位團員來訪。
2006.3.21	台灣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劉盛良、秘書長林烈豪、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特派代表胡為真代表、副組長宋申武到訪。
2006.5.25	廣西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8 位代表到訪。
2006.5.31	梅州市外事橋務局局長李明權、副局長黃勝平、杜茂江來訪。
2006.6.5	四川省僑務主任周敏謙率領四川省僑務經貿考察團 12 位代表到訪。
2006.7.8	居鑒客家公會 40 人代表團由姚森良會長率領到訪。
2006.7.30	梅州市人民政府經貿代表團 11 人到本會，舉行招商引資推介會與「中國廣東梅州市招商引資聯絡處」揭幕禮。
2006.10.6	中共河南省常委、省委統戰部部長、河南省海外聯誼會會長曹維新率領 14 人代表團蒞臨作聯誼交流。
2006.11.3	中國廣東省南方日報 3 位記者到訪。
2006.11.12	新山客家公會會長蕭光華率領 26 位鄉親到本會作訪問交流，雙方簽署「新柔客屬共商促進會」。
2006.11.17	台灣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劉盛良率領 7 人代表團蒞臨。
2006.11.24	梅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團一行 4 人由鄭少偉副市長率領到訪。
2006.11.25	揚州市維揚區人民政府區長顧敏率領 10 位經濟考察團來訪。
2006.12.19	豐順縣經濟考察團 6 位成員由縣委書記、縣人大主任李忠良率領到訪。
2007.3.5	廣東省僑辦訪問團 4 位代表由主任吳銳成率領來訪。
2007.6.5	廣東省梅州市歸國華僑聯合會，由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翁永衛率領 4 人代表團到訪。
2007.7.16	曲阜市「大哉孔子藝術展」代表團一行人 10 人蒞臨，孔繁彪（孔子第 74 代孫）率領。
2007.8.11	廣東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副主任、廣東省海外交流協會副會長林琳、聯同廣東省僑辦外聯處調研員梁金安、僑辦秘書處科員鍾春光來訪交流。
2007.9.13	寧化石壁客家祖地訪問團由人民政府縣長巫福生率領 13 名代表到訪。
2007.9.21	梅州電視台（客商）攝製組 3 位代表：徐愛玲（總編導）及謝石峰、林玉錦到本會攝製專輯。
2007.10.25	顏金勇政務部長率領政府華社聯絡組 7 位國會議員於本會召開與民對話交流會。

2007.11.1	梅州市外事僑務局局長宋才華率領 7 名團員來訪。
2007.11.5	梅州市領導培訓團 28 位團員到訪，包括縣、市領導。
2007.12.16	怡保三德中學華樂團師生一行 45 人到本會與華樂團進行演出交流。
2008.3.13	廣東省梅州市嘉應學院副校長邱國鋒、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長房學嘉到訪。
2008.10.5	梅州市領導由李純德率領，一行 6 人到訪。
2008.11.11	廣東省梅州市歸國華僑聯合會三位代表來訪：梅州市委組織部副調研員黃錦亮、僑聯副主席湯志平、市委組織部人才科科長黃華生。
2008.12.5	梅州（新加坡）人才培訓基地掛牌揭幕儀式於本會舉行，主持儀式的海外嘉賓有：梅州市常委、組織部長翁永衛、香港梅州聯會余鵬春會長。
2008.12.21	本會舉行《新馬台客家歌曲交流會》，嘉賓有大馬客聯婦女組主任潘斯里謝淑珍博士、該山歌團、以及台灣高雄市客家鄉音樂團員。
2009.5.7	香港梅州聯會領導余國春及會長余鵬春賢昆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協委員、香港梅州聯會資議會主席林光如鄉賢，聯同 15 位鄉親蒞臨本會，作聯誼交流。
2009.5.11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王嵩山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執行長蕭新煌教授、馬來新亞沙勞越大學張維安博士（按，應是台灣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利亮時博士來訪。
2009.6.18	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參贊龔春森先生蒞臨，與本會領導進行交流。
2009.8.12	梅洲日報「天下客商」5 人訪問團，由社長李向陽帶領到訪。

資料來源：根據《南洋客屬總會八十週年紀念特刊》彙整。

附錄 4 2010-2015 年「南洋客屬總會」的接待與參訪交流活動

2010.7.11.	柔佛峇株吧轄客家公會鄉親到訪
2010.11.29-12.1	組團出席 23 屆世客大會，廣東河源市。
2010.10.12	夏威夷檀香山崇正會鄉親到訪。
2010.12.8	梅州市黨政領導幹部赴新加坡培訓團到訪。（本會贊助培訓費 1 萬元）
2010.12.22	台灣客委會主任委員黃玉振到訪。
2010.12.24	梅州市歸國僑聯委員會幹部到訪。
2011.4.9	河南省客家聯誼會到訪。
2011.5.10	廣東省僑辦暨廣東省海交會到訪。
2011.5.25	廣西省北海市政府代表團到訪。
2011.9.21	福建省寧化石壁客家宗親聯誼會到訪。
2011.11.15-17	組團到台灣台北市參加「2011 全球客家懇親大會」
2011.11.21	福建省三明市世客大會考察團到訪。
2012.1.3	廣東梅州嘉應學院院長到訪。
2012.3.19	中國海外交流協會代表團到訪。
2012.5.22	福建省三明市客家交流團到訪。
2012.11.5	河南省世界客家播遷路全球文化交流團到訪。
2012.11.20-22	組團參加福建三明市舉辦的「第 25 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2012.11.25	福建省三明市僑務代表團到訪。
2013.1.23	馬來西亞美里客家公會代表團到訪。
2013.5.24	閩西客家聯誼會代表團到訪。
2013.9.9-11	組團出席於印尼雅加達舉辦的「第 26 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2013.9.12	中國開封市政府代表團到訪。
2013.11.16	梅州市投資環境推介會代表團到訪。
2014.1.17	台灣新竹市代表團到訪。
2014.4.21	梅州市旅遊局代表到訪。
2014.8.23	客總會舉辦「建國 49 周年暨本會成立 85 週年慶」晚會。出席主賓為新加坡內閣貿易及工業部張思樂，以及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總領事劉紅梅。
2014.10.17-19	組團參加中國河南開封市「第 27 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2014.12.17	廣東省惠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團到訪。
2014.12.37	海南省客家商會代表團到訪。
2015.5.23	梅州市委書記黃強率代表團到訪。
2015.10.16-18	參加台灣新竹主辦的「世界客屬第 28 屆懇親大會」

資料來源：根據《客總會訊》，第 59、60(紀念特刊)、61 期的文字資料統整製表。

附錄 5 2010-2015 年「南洋客屬總會」的文化交流活動

2010	參加北京第 10 屆國際合唱節，客總合唱團獲混聲組金牌。
2010.9.4	客總合唱團參與宗鄉總會舉辦的「宗鄉之夜」演出。
2010.9.10	與芳林公園聯合舉辦第四屆「戲曲山歌滿芳林」之「兩地山歌長堤情」。 (以後每年舉辦)
2010.12.15-20	參加第四屆中國(梅州)國際客家山歌文化節參賽。
2011.2.22	組 35 員代表團參加馬來西亞柔佛古廟眾神行宮山歌演出。(每年皆參加)
2011.6.27-7.8	組團參加台灣海外客家歌謠研習班。
2011.10.28	「客總華樂團」受邀到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演出「傾聽客韻」新年音樂招待會。(此項活動為中國大使館首次與新加坡民間團體合作)
2012.11.22	組團出席梅州市首屆客家文化藝術節。
2012.11.8-10	組團參加「第三屆八省客家山歌邀請賽(東莞—鳳崗)」,榮獲金牌。
2013.3.11-16	負責統籌拍攝由中國僑聯和中央電視台 CCTV 所製作的百集電視影片:「客家足跡行——新加坡篇」。
2013.5.5	客總合唱團與「濱海藝術中心音樂廳」舉辦「歲月留歌」文藝晚會。
2013.8.2-4	客總合唱團榮獲「第四屆新加坡國際華文合唱節」金獎。
2013.10.25	「廣西暨高州會館 130 周年慶」,聯合高州會館舉辦「第九屆客家歌謠觀摩會」
2013.11.10	於客總大會堂舉辦「客總華樂團成立 31 週年音樂會」。
2014.1.18	聯合茶陽(大埔)會館及台灣竹友男聲合唱團舉辦「迎春歡歌—新台合唱交流音樂會」。
2014.2.23	主辦「新加坡客家方方面面」講座。
2014.8.30	參加在馬來西亞新山,由「新山客家公會」舉辦的「第四屆馬來西亞全國客家歌樂節」。新加坡一共有七支隊伍與會:武吉班讓客屬公會合唱隊、茶陽會館合唱團、茶陽會館客韻團、嘉應五屬公會合唱團、應和會館山歌團、豐順會館合唱團。
2014.12.27	客總合唱團與茶陽客家合唱團,一起參與與濱海藝術中心由新加坡合唱總會舉辦的「向建國一代致敬—濱海歡歌 2014」。獻唱多首客家山歌。
2015.3.10	客屬總會與各客家會館一起參與柔佛古廟眾神行宮演出。
2015.5.16	主辦「客家飲食文化面面觀」講座

資料來源:根據《客總會訊》,第 59、60(紀念特刊)、61 期的文字資料統整製表。

附錄 6 2010-2015 年「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的學術團體與推廣活動

2010.8.3	新加坡「梅州人才培訓系列」之梅州財稅領導幹部到訪。
2010.9.1	廣東河源市 28 位政府官員培訓團到訪。
2010.10.26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暨客家研究中心學者到訪。
2011.6.12	廣東河源市新加坡城市規劃管理高級研修班培訓團到訪。
2012.8.18	廣東河源市新加坡公共管理高級研修班學員到訪。
2012.8.12	梅州市新加坡教育管理研修班學員到訪。
2012.12.4	梅州市 2012 年幹部人才培訓團到訪。
2013.6.17	台灣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學者到訪。
2013.8.15	台灣元智大學中文系師生到訪。
2014.4.21	與梅州市旅遊局聯合舉辦「梅州—新加坡，兩地旅遊事業推介會」。
2014.11.29	廣東省海外交流協會《廣東華僑史》專家學者到客屬拜訪與調研。
2014.12.17-26	客總派出五名學生參加「第三屆東南亞華裔青少年冬令營」。

資料來源：根據《客總會訊》，第 59、60、61 期的文字資料統整製表。